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

鲁克兵/著

本书承认杜甫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兼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同时，对杜甫所受佛教影响及其在诗文创作、艺术欣赏乃至生活中的表现，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对杜甫与佛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梳理。重点考查宗教如何影响杜甫的创作，导致其在创作观念、风格与方法上的革新。本书对杜甫与各宗派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探讨，是这一领域的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

鲁克兵/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鲁克兵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5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760-3

I. ①杜… II. ①鲁… III. ①杜甫(712~770)—人物研究
②杜甫(712~770)—佛教—信仰—思想评论 IV. ①K825.6
②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2997 号

本书获得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

鲁克兵 著

dufu yu fojiao guanxi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25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ISBN 978-7-5664-0760-3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卢 坡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伶俐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杜甫佛教思想之背景	〔009〕
第一节 杜甫的儒家思想简论	〔009〕
第二节 杜甫的道家、道教思想简论	〔016〕
第三节 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佛教概况简述	〔026〕
第四节 杜甫家世的佛教影响	〔037〕
第五节 杜甫儒道释思想的消长	〔042〕
第二章 杜甫所游历的佛教景观	〔054〕
一、龙门奉先寺	〔054〕
二、龙门其他佛寺	〔057〕
三、已上人茅斋	〔059〕
四、大慈恩寺	〔060〕
五、翠微寺	〔063〕
六、云际寺	〔065〕

七、云门寺	[066]
八、大云寺	[069]
九、瓦官寺	[071]
十、城北寺	[075]
十一、南郭寺	[077]
十二、赞公房	[080]
十三、太平寺	[081]
十四、山寺	[083]
十五、法镜寺	[085]
十六、草堂寺	[086]
十七、新津寺	[088]
十八、四安寺	[090]
十九、修觉寺	[091]
二十、惠普寺	[092]
二十一、香积寺	[093]
二十二、牛头寺	[094]
二十三、兜率寺	[097]
二十四、惠义寺	[099]
二十五、鹤林寺	[102]
二十六、龙兴寺	[103]
二十七、伏毒寺	[104]
二十八、始兴寺	[105]
二十九、大觉高僧兰若	[106]
三十、真谛寺	[106]
三十一、天皇寺	[108]
三十二、麓山寺	[109]
三十三、道林寺	[111]

第三章 佛教与杜甫的交游 [113]

一、李白	[113]
------------	-------

二、李邕	[116]
三、吴道子	[120]
四、张均、张垪	[122]
五、薛据	[126]
六、高适	[127]
七、岑参	[130]
八、储光羲	[133]
九、杜位	[135]
十、郑虔	[136]
十一、杜济	[138]
十二、许十一	[139]
十三、薛华	[142]
十四、赞公	[144]
十五、杜亚	[149]
十六、严挺之、严武	[150]
十七、王维	[155]
十八、旻上人	[164]
十九、李舟	[165]
二十、杨綰	[166]
二十一、裴迪	[168]
二十二、王缙	[170]
二十三、玄武禅师	[172]
二十四、文公上方	[174]
二十五、房琯	[175]
二十六、信行	[179]
二十七、大觉高僧	[181]
二十八、真谛寺禅师	[182]
二十九、太易沙门	[183]
三十、韦之晋	[185]

三十一、李文嶷	〔187〕
三十二、任华	〔191〕
第四章 杜甫的佛教思想	〔196〕
第一节 杜甫佛教思想的现实基础	〔196〕
第二节 杜甫与北宗禅	〔204〕
第三节 杜甫与南宗禅	〔220〕
第四节 杜甫与净土	〔232〕
第五节 杜甫的慈悲情怀	〔246〕
第五章 佛教与杜甫的诗歌创作	〔262〕
第一节 佛教与杜甫诗文的闲静情调	〔262〕
第二节 杜诗动静关系中的相即原理	〔285〕
第三节 佛教与杜诗创作方法	〔295〕
第四节 佛偈与杜甫以文为诗	〔315〕
第六章 杜甫与佛教艺术	〔331〕
第一节 杜甫与佛教建筑艺术	〔332〕
第二节 杜甫与佛教雕塑艺术	〔338〕
第三节 杜甫与佛教绘画艺术	〔341〕
第四节 杜甫与佛教音乐艺术	〔355〕
第五节 杜甫与佛教舞蹈艺术	〔365〕
第六节 杜甫与佛教书法艺术	〔374〕
参考文献	〔384〕
后 记	〔393〕

导 言

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诗圣杜甫自古以来就是研究的热点。古人论杜诗的思想倾向，每每称道其忠君恋阙之德、伤时忧国之志、民胞物与之心。正如仇兆鳌所说：“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前塞、后塞诸曲，痛书烽镝阡危；三吏三别数章，惨诉闾阎疾苦。”^①其言很有代表性。现当代研究者之讨论多集中在杜甫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人道主义等方面。杜甫的思想几乎被看作全是儒家思想。

杜甫的宗教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素来少有涉及。在古代，偶有残丛零语，如钱谦益、仇兆鳌、杨伦等注杜时涉及佛教方面的文字，多因训诂词句、阐释诗意而生发。近、现代国势陵夷，时局动荡，故研杜者着意发掘杜甫诗文中现实因素，而像梁实秋《杜甫与佛》这样的短文也颇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宗教研究陷入低潮，而杜甫又是人们喜爱的古代伟大诗人，若无特别的原因，学者们自是不大愿意讨论他的宗教

① 仇兆鳌：《进书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351页。本书引杜诗主据《杜诗详注》，偶酌用《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信仰问题,或者干脆加以回避乃至否认^①。面对“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这样的诗句,学者们仍然说:“他可以不作诗,也可以不饮酒,但要他割下妻儿出家,却办不到。这都充分说明佛家思想对杜甫实无若何影响,虽然他并非不懂得佛学。”^②这种情况恰如陈允吉教授在《略辨杜甫禅宗信仰》一文所论:“晚近诸家评论杜甫,则很少去研究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有的甚至根本不承认他受过佛教的熏染,这种认识显然不大符合杜甫的实际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关于杜甫”部分,有《杜甫的宗教信仰》一文,这是当代国内最早论述杜甫宗教信仰问题的专文,谈佛教信仰只是该文的一部分。此文指出杜甫是禅宗的信徒,并从杜诗中找出十七处例证,对我们今天从宗教角度研究杜甫颇有启发性。刊于《哲学研究》1978年第6期的吕澂先生的《杜甫的佛教信仰》是一篇专门讨论杜甫佛教信仰的论文。该文认为杜甫佛教思想有个变化的过程:首先信仰北宗禅而“完全与南宗禅无涉”,后来“禅宗思想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此文很有参考价值,惜未能充分展开。陈允吉师《略辨杜甫禅宗信仰》一文,刊于《唐代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是首次详论杜甫禅宗信仰的专题论文。论文以对郭沫若《杜甫的宗教信仰》的评论为线索,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盛唐禅学的历史背景,二是关于双峰寺在何处,三是关于七祖是谁。第一个问题根据南北两宗禅在盛唐力量的消长,并结合当时佛教的地域特征,从纵横两方面加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杜甫对北宗禅的信仰。第二个问题论证了双峰寺的地理位置,即蕲州东山,而非曹溪双峰山。第三个问题说明了杜诗中的七祖乃普寂而非曹溪。近年来,谢思炜《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

① 陈允吉:《略辨杜甫禅宗信仰》,见《佛教唐音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② 萧涤非:《杜甫研究》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页。

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论述了杜甫在四川时受到净众、保唐禅的影响。刘卫林《杜甫与禅学》(《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着重对杜甫与佛教关系的论述作出自己的评论。朱学东《杜甫与禅佛宗风》(《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以“读破”、“诗兴”等八个关键词,考察杜甫的诗论观。邓绍秋《杜甫晚年的禅宗意趣》(《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论及杜甫禅宗思想在诗歌中的表现,但仅仅泛论悲苦,没能深入探讨。张培峰《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据浦起龙《读杜心解》,重申“双峰寺”在潭州,七祖系南岳怀让之说。此外,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一书中《王维、杜甫与禅》一文以杜甫诗歌为材料论及他与僧人居士的交往,约四页左右的篇幅。其他尚有钟莱茵《论杜甫与佛教》(《草堂》1983年第3期)、陈枫《略论佛教对杜甫思想的影响》(《管理与教学》1991年第3期)、袁志峰《也谈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抗敌《试论杜甫的遁世思想和道教、佛教思想》(《台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等论文,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前述诸家的范围。在台湾,易君左的《杜甫的宗教思想》、曾志罡《杜甫的佛教信仰》、蔡惠明《杜甫的佛教因缘》等论文,均以杜甫的诗文为证,综论杜甫的佛教信仰。在日本,黑川洋一讨论了杜甫与禅宗各派的关系,认为杜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对佛教极为关心,其诗中儒、道、释成分常融合难分。

诚然,从杜甫的人生经历及价值取向来看,儒家思想是其主要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道、释固然有质的不同,但三者自南北朝时便有融合的趋势,这在唐代也是非常明显。杜甫虽有致君舜尧的儒家理想,但在仕途偃蹇时,常常以佛家、道家思想来加以调适。因而,在杜甫的人生旅途中,尤其是晚年,宗教在杜甫生活上与心理上的协调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德国学者莫芝宜佳认为:“在中国,相对于

‘佛教徒’王维和‘崇尚道家’的李白，杜甫通常被视为‘儒家诗人’。然而杜甫却经常称自己为‘隐士’。对孔子的攻击，对庄子 and 佛祖的颂扬，以及反对儒家的、仇视文化的愚昧理想等道家思想母题不仅出现在‘道家诗人’李白的作品中，也出现在‘儒家诗人’杜甫的诗篇里。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却用两把尺子来衡量。凡是李白认可的东西或人们期望于他的东西，诗圣杜甫都不认可。这样的结果是：对杜甫道家的和佛教的自我表现，人们至今仍然讳莫如深——或者被粉饰，或者被批判。”^①鉴于宗教在杜甫世界观、审美观念、日常行为、精神生活、心理情境、文学创作、艺术欣赏诸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杜甫和宗教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前为数不多的关于杜甫和宗教关系的文章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杜甫的论文与著作中就格外值得珍视。然而，这些文章或综论其宗教信仰，限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或探究个别具体问题，因未能较全面加以讨论而留下较多的需要继续探索的地方。

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来看，其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大致有着自合至分及自分至合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学者与信众主要是以儒家和道家为参照来理解佛教的。儒家的仁爱近于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无为近于佛家的涅槃。如宗炳云：“孔氏之训无求生以害仁，又杀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矣。老子明无为之至也，即泥洹之极矣，而曾不称其神通成佛。”^②汉宫中黄老、浮屠并祀，当时人们认为二者并无大异。魏晋时期，人们往往是通过玄学来认识佛学，讲说佛经常用格义的方式，尽管这种格义并不准确。例如，本无是玄学的本体论的根本，僧人居士们将玄学的本无来比附佛家的真如佛性。关于这一点，吕澂先生曾说过：

① 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② 宗炳：《明佛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2页。（以下此版本皆简称《大正藏》）

例如,关于“如性”这一概念,当初译为“本无”。现在考究起来,这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并不必否定了不实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时就表示出来了。所以佛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叫做“自性空”,“当体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成“本无”原不算错。而且“无”字也是中国道家现成的用语。要是了解“本无”的来历,本来不会产生误解。但这种用意只有译者本人了解,译出以后,读者望文生义,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最初把这一概念同老子说的“无”混为一谈,以后联系到宇宙发生论,把“本”字理解为“本末”的“本”,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这一误解并未因它的译名重新订正而有所改变。例如,以后“本无”改译成“如如”、“真如”等,反而错上加错,以至于认为是真如生一切。^①

正是通过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使得佛教在中国与印度本土佛教发生了偏离。玄学与佛教的“合”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解所致。魏晋佛教从义理上说并没有完全从玄学中脱离出来,僧肇曾在《肇论》中加以总结与批判。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和儒、道的差异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儒、道的冲突也日益激烈。佛教的中国化,正是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基础上,中印文化产生交流碰撞的结果。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佛教既相对独立发展,同时又是在吸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以禅宗为例,原来与印度佛教相合的如来禅逐渐衍化成极具中国特色的祖师禅,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重视直觉的感悟,追求自然,以平常心为道,守本真心,无心合道等等,都和道家非常相似,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明显受到道家影响的结果。

①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3页。

可见,中国佛教既不同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传统文化,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印度文化,而是两者摩荡交融后的化合物。然而,在时下讨论中国文学和中国佛教关系时,有一种流行的偏见,认为中国佛教中和传统文化相同或相通的部分不当隶属于佛教,而只有当中国文学受到印度佛教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不同的部分的影响时,文学和佛教的交流关系才算真正发生。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混淆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区别。诚然,中国文学和印度佛教的相互关系值得认真研究,但不可仅因重视印度佛教中被中国佛教吸纳且中国传统所无的这一部分,而缩小中国佛教的研究范围,从而在实质上将文学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研究置换为文学与印度佛教之关系研究。这种认识甚为偏颇,为从佛教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设置了障碍。玄学和佛教的关系即是一例。汤用彤先生说:“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的人士所接受。不过以后佛学对于玄学的根本问题有更深一层的发挥。所以从一方面讲,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说是玄学。而佛学对于玄学为推波起澜的助因是不可抹杀的。”^①因而,很难想象排除玄学的内容和背景而在义理上讨论纯粹的魏晋时期的中国佛学。从传统文化和禅宗的关系来看也是明显的一例。如印顺法师所言:“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②因此,很难找到排除了老庄玄学的中国禅宗,要求排除老庄玄学来讨论禅宗也是荒唐的。吕澂先生说:“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两者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就是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③笔者以为此言极有道理,足以作为讨论杜甫与中国佛教关系的指导思想。

①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04页。

② 印顺:《中国禅宗史·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③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巅峰时代,各宗派获得独立发展,高僧大德若群星之璀璨。朝廷为了笼络宗教人士,经常将德崇望尊的大师延入宫中供养,王公大臣执弟子之礼,这些无疑提高了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社会上形成仰慕肥遁之士的风气,名僧名士交游的传统,士大夫以参禅论道为尚。“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①,言辞中颇有几分自矜。在这种环境下的杜甫受到一定感染当是合于情理的。

杜甫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但其老庄思想成分也颇明显。不过,杜甫生活在上述宗教环境中,“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故其思想上看起来有些似乎原本是老庄的成分,事实上就并不十分纯粹了,还应当从佛教的禅宗背景进一步探讨,而不应仅以老庄传统所固有目之。我们可以就《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一诗略作分析:

不见秘书心若失,及见秘书失心疾。
安为动主理信然,我独觉子神充实。
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
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

此诗若只观前四句,似乎源于老庄之道,而在叙述上用倒叙。李秘书神情“充实”,乃是知道识理,其理主要在于“安为动主”。“我”见秘书闻其理,心能安;不见秘书不闻其理,则心不安。可见,“我”对于李秘书所言之理处于若有所悟而未能深悟的状态。“充实”一词,孟子也曾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②,但庄子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

① 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763页。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334页。

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①，显然和杜甫诗意更接近。至于“安为动主”，“安”者，静也；静而后心乃能安。此语从字面上看显然出于《老子》：“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②全诗若仅仅只有此四句，用典也是出于老庄，似乎与佛教毫无关系。但是，士大夫耽于禅理的氛围、杜甫对佛教的认可，以及龙兴寺的佛教氛围乃至写诗切题的要求等等，都可以提示我们，这四句并非只是发扬道家玄理，而是在道家词汇的背后，有杜甫要表达的佛教意趣。“充实”一词，在佛经中也常习用，多用来形容诸佛菩萨法力功德等之圆满。如：“有此十种不可思议，诸比丘，又诸天身，充实不虚，悉皆平满”^③；“气力充实而得益，除饥渴恼心获安”^④；“世尊髀腋悉皆充实，是第十七”^⑤；“诸根明利，内藏充实，毒不能侵，病不能伤”^⑥；“睹此变化，无央数众皆发道心，得悦可意充实饱满”^⑦。至于佛经中强调静而不动随处可见，如“菩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⑧。杜甫从李秘书处所闻之道主要是佛经，我们不能因杜甫仅仅使用了老庄用过的语词便断言此诗前四句仅仅是在言老庄而与佛教没有关系，佛经中习用的词汇对杜甫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杜甫诗文特定的内容，我们既承认儒、道的熏习，又重视佛教文化的浸染，才是比较科学的研究态度。

① 王先谦集解、刘武补正：《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99年，第296页。

② 老子：《老子》第26章，《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页。

③ 达摩笈多译：《起世因本经》，《大正藏》第1册，第399页。

④ 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32，《大正藏》第3册，第802页。

⑤ 玄奘奉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81，《大正藏》第6册，第967页。

⑥ 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5，《大正藏》第10册，第135页。

⑦ 竺法护：《大宝积经》卷8，《大正藏》第11册，第44页。

⑧ 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1，《大正藏》第12册，第366页。

第一章 杜甫佛教思想之背景

中国古代文化丰富多彩,杜甫善于转益多师,因而,他的思想乃至艺术创作的源头是多样的。但择其要者,仍然是儒、道、释三家。这里囿于篇幅和行文,其他方面不作讨论。

第一节 杜甫的儒家思想简论

从杜甫的出处来看,儒家思想在其一生中无疑占据主要地位。据莫砺锋先生统计,杜诗中用“儒”字共有四十四处^①。“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落魄不遇,杜甫还是给自己戴上“儒冠”作为标志。

纵观杜甫的行为及诗歌,儒家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倾向均已具备。杜甫很有仁爱之心,曾自称“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他对耕田之夫、失业之卒、落难王孙、流亡百姓、鳏寡孤独都具有深切的同情,并愿意为他们作出牺牲。杜甫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就意味着残酷地戕害生命,这是不仁的。虽然他强烈地支持平定叛乱、抵抗异族的侵略,但对战争中大量士卒、百姓被“残害为异物”(《北征》)而痛心疾首。杜甫很重视义,他

^① 参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把直言进谏作为义的表现，他为这种义的行为付出了得罪肃宗的代价而不生悔吝之心。同样，他以蔡十四著作、窦侍御等人的进言为义：“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安知蔡夫子，高义迈等伦。”（《别蔡十四著作》）“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他把急朋友之难视为义：“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彭衙行》）他又以复仇行为为义，他赞美一个因幼子被白蛇所食而复仇的老鹳“聊为义鹳行，用激壮士肝”（《义鹳行》），使人联想到杜甫的为父报仇的二叔杜并。杜甫不仅重视君臣等级的伦轨，也珍视血缘之亲情，杜甫有不少诗歌写到妻子、儿女、姊妹，都写得情真意切。“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羌村》），战争纵然是一把尺子，也量不完诗人夫妇间的情意；“乱世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诗人的亲子之爱从内心的深处汨汨流淌；“江阁嫌津柳，风帆数驿亭”（《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诗人的兄弟之情又岂是“津柳”、“驿亭”所能阻隔的。

杜甫家世乃是世代为儒。《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儒家之所业，“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明师则显荣”^①，杜家世代都是做着这样的工作。杜甫又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的确如此，如果从魏尚书杜畿之子杜恕算起为一世，则为：杜恕，一世，魏明帝时曾任散骑黄门侍郎，后又为幽州刺史；杜预，二世；预子杜耽，三世，封亭侯，凉州刺史；杜顾，四世，为西海太守；杜逊，五世，曾任魏兴太守，在东晋初年迁徙到襄阳，杜甫祖籍襄阳自此始；杜灵启，六世；杜乾光，七世，在萧齐时任司徒右长史；杜渐，八世，任梁边城太守；杜叔毗，九世，北周时任碭州刺史；杜鱼石，十世，隋时任获嘉县令；杜依艺，十一世，历任监

① 韩非：《五蠹》，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451页。